

浙東文化

EASTERN ZHEJIANG CULTURE



1997 2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王 静

封面摄影：潘行正

封底篆刻：高式熊



浙东文化·资料汇编(四)

1997年第2期(总第八期) 1997年12月出版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
《浙东文化》编辑部编辑

主 编：李克西
执行主编：董贻安

印刷：浙江省鄞县文教印刷一厂

订阅：宁波市文化局文物处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秘书处
(宁波市北大路91号 邮编：315010)

浙出书临(98)第008号

'97 对外文化交流在宁波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宁波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陈 炎(2) ✓
于越族的海外移民	杨成鉴(10) ✓
浙东制瓷技术东传朝鲜半岛之研究	林士民(16) ✓
论唐宋时期往来中日间的“明州商帮”	虞浩旭(32) ✓
近代上海与宁波两港之比较研究	周庆南(44)
徐福东渡与中日民间交流	方印华(59)
寒岩发炎叶知秋	
——日本和高丽佛教临济宗的浙东祖庭	杨古城 曹厚德(68)
宁波地区出土的越窑青瓷与外来文化初探	施祖青(76) ✓
明州与日本的书画交流	金 皓(83)
朱舜水的寓日故国友人考略	诸焕灿(93)
从宁波出土外销陶瓷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关系谈	
	虞逸仲(104)
宁波近代建筑刍议	许孟光(110)
古越文化与日本民俗	黄浙苏(116)
关于宁波作为吴东渡日本出海口问题的思考	李 军(125)
唐代明州与西亚波斯地区交往——从出土波斯陶谈起	
	傅亦民(131)
谈三国西晋文物的佛像装饰与中外文化交流	王莲瑛(139)
秦渡庵及其灵台岩画	章均立(145)
明州南路古驿道遗迹考察漫谈	章国庆(157)

浅述明州港在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主要地位·····	周丽丽(163)
明清时期宁波地区“海盜式”私人海上贸易初探·····	章 玲(168)
阳明学与日本明治维新·····	孙栋苗(176)
宁海县古代海外交流史综合考证(之一)·····	滕延振(182)
朱舜水与日本“后乐园”·····	鲁怒放(190)
鄞县佛教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与影响·····	徐惠定(197)
发挥高丽使馆遗址的载体作用,促进中韩友好交往·····	龚丽君(204)
延庆、观宗两寺与对外交流·····	陈联飞(210)

· 学术动态 ·

《浙江宁波唐国宁寺东塔遗址发掘报告》在《考古学报》 发表·····	(209)
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第八次研讨会暨'97年会在徐州召开·····	(215)
市文博学会7部(篇)专著(论文)获宁波市第五次 (1994—199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215)

· 文博简讯 ·

“庆回归”宁波市首届民间收藏精品联展·····	(9)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二期工程动工·····	(30)
范宅维修竣工暨古玩市场开业·····	(82)
宁波又添十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3)
宁波文物商店在'97上海首届全国文物工艺品展销会 和参加经营学术研讨会上成果显著·····	(115)
我市竖立第二批历史文化遗址碑·····	(124)
宁波市举行“名城公布11周年宣传周”系列活动·····	(130)
宁波市文物商店赴新加坡举办文物精品展销·····	(203)

责任编辑

褚晓波

编者的话

宁波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自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经唐宋至近现代，对外文化交流延绵不断，源远流长，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足以与国内同类名城比肩。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宁波对外文化交流诸领域中的史实及其在各个时期的特征、成就、影响等，扩大宁波历史文化在域外乃至世界范围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为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献计献策，贡献力量，1997年12月7-8日，宁波市文化局、宁波市文博学会联合召开‘97对外文化交流在宁波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对外文化交流在宁波”的研讨，此次讨论会自今年下半年筹备起，就得到全市广大文博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国内中外关系史界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共收到论文30余篇。这些论文论题广泛，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新颖，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宁波对外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揭示了宁波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反映了目前我市对这一重大课题研究工作达到的学术水平，显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其中部分论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浙江省人大副主任毛昭晰教授公务繁忙，仍百忙之中专程出席并作重要学术讲话。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和杭州大学王勇教授分别作了“宁波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书籍之路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学术报告。

本刊特将这一期辟为专辑，遴选论文26篇予刊登，以饕学术界同行与广大读者。

宁波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 陈 炎 □

宁波秦称鄞县，唐称明州，元一度称庆元，明初始称宁波，一直沿用至今。它位于东海之滨，附近岛屿棋布，良港众多，自然条件优越，当地先民自古就在海上进行航海和生产劳动。秦时，秦始皇曾遣徐福东渡，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路以来，鄞县顾名思义就含有“贸易城市”的雏形，它以向外传布丝绸为纽带，与世界各民族进行了互利的友好往来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盛唐时，随着当地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不断提高和港口建设的迅速发展，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需要，遂将“鄞县”改制为“明州”，成为东海航路中的著名海港城市。

宁波港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的不断建设、经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更加日益频繁，物别是公元702年开辟了南路航线后，更大大缩短了明州（宁波）与日本的航程，于是大量的中国丝织品、陶瓷、其他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就源源不断地远销日本、朝鲜。同时，从明州港南下，也可远销到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和东非等国家和地区。明州港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在宋、元、明各代，特别是在郑和七下西洋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最高阶段，达到了鼎盛时期。

宁波港属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时风6—10月常为东南偏南风，10—2月刮西北偏北风，古代航海必须凭借风力，这种时风对航

行无论北上南下，或东渡日本都十分有利。全年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富饶，腹地广阔，河网交织，外海、内河，特别是与南北大运河相连接，海陆交通十分发达，是江浙各地商品、货物进出口的集散中心。它背靠峰峦绵连的四明山，面临碧波浩瀚的东海，既有风光旖旎的山水，又有众多的名寺古刹、佛教圣地。这里的珍贵历史文物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它把江南景色的秀丽与滨海城市的繁华融为一体，因此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自古以来吸引着海外各国人士纷纷前来宁波进行贸易、旅游、参观访问和进行各种文化交流等活动，终年商贾云集，海舶交至，素有“浙东第一商埠”之称。因此，11年前国务院批准宁波为“国家文化历史名城”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的。重温这段历史，鉴古知今，鉴往知来，结合当今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将宁波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海港城市，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探讨“对外文化交流在宁波”，是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今天，我只想简单讲讲宁波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各国进行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这个问题林士民先生写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一书中，已经作了详细论述，我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再作些扼要介绍。

我国是最早发明丝绸，也是最早向海外传布丝绸的国家，要谈海上丝绸之路，就得先从丝绸讲起。据《四夷广记》记载，徐福东渡时带去“舟师百工”和“珍宝五谷”，学者们认为徐福东渡与日本产生弥生式文化的年代不相上下。再从日本于1966年在弥生文化时期的立岩遗址（在今福冈县饭冢市）发现中国大陆的丝织品，因而认为弥生文化是由徐福传入的。难怪日本人民把徐福当作蚕桑之神，至今每年都要到徐福墓地或神社参拜祭祀。因此，徐福不但是东海航路的开拓者，也是中国文化的传布者。自徐福东渡后，宁波一直是东海航路通往一衣带水的日本、朝鲜的重要海港。它在发展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

鲜时，养蚕织绸的技术已经传入朝鲜。后来秦始皇兵吞六国时，我国沿海人民为逃避兵役其中有许多丝织工匠，不断泛海迁往朝鲜。从此，不但传入中国丝绸，而且也促进了当地丝织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三十多年前在朝鲜平壤乐浪区土城的千余座汉代古墓中，出土了越州生产的大量绢、绌、罗等丝织品。这是我们浙东地区产的丝绸早在秦汉时期已经从海路传入朝鲜的历史见证。

据《日本书纪》记载，中国蚕种在公元 199 年就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东传到日本。它和我国《三国志·魏书》记载的倭国（今日本）“产纆麻蚕桑，出细纆缣绵”的年代大致相同，可以互相印证。公元 238 年倭国女王遣使携礼品来魏都洛阳，魏明帝回赠江南产的各种丝绸，作为外交上的礼品。这是我国江南养蚕植桑、缣丝、织绸，乃至染色等技术，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

南朝时，江南的吴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于是日本出现了“吴服”（即今和服），对促进日本丝织和服饰工艺起了很大作用。

唐朝的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遣唐使来完成的，唐时的江南东道是生产丝绢的主要产地，据杜佑统计天宝年间仅丝绸的税收，每年就达 2100 万匹，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能产“薄如蝉翼，飘似云雾”的精美丝绸，是当时外销商品中最受日本人民欢迎喜爱的商品，江南不仅是丝绸瓷器的主要产地，而且也是我国著名的造船基地，越州、明州，都能造载重万石的大海舶。这样，就为海上丝路的发展提供了外销商品的来源和商品外传的运载工具。自从公元 702 年由日本粟田真人率第七次遣唐使，开辟了由日本南岛横渡东海直达宁波港的南线后，放弃了以往掠朝鲜半岛的北线航路，大大缩短了航程（顺风只需三天就到达日本）。从此以后，宁波就成为日本遣唐使到中国的主要港口，外海与内河（大运河）连接可直达唐都长安。遣唐使名义上虽是日本贡方物，而唐亦回赠日本人最喜爱的丝绸作为赏赐，如公元 805 年一次赏赐水手以下每人赐绢五匹，共 270 人，赐绢达 1350

匹,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丝绸贸易。在中国丝织品大量传入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仿制“唐绫”的“博多织”纺织技术。唐时的宁波港通过遣唐使与日本的交往,其地位就更加重要,它与日本、朝鲜在发展贸易往来、政治、经济和宗教、艺术等等各个领域的文化交流,都有了新的突破,东海航路从那时起,就进入了发展时期。(详见拙著第28页和255页)

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早在三国时就从中国传入精美的丝绸,被称为“锦绣”,如《三国志·魏书》记载朝鲜高句丽人“衣服皆锦绣”,我国自汉代开始将织锦与刺绣融为一体,合称“锦绣”。后人就把它作为“最美丽”的象征,如“锦上添花”、“锦绣河山”等等,可见中国通过东海航路传入朝鲜、日本的丝绸都是第一流的。

中国发明丝绸已有悠久的历史,从河姆渡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7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知道养蚕和纺织。后来又在浙江吴兴钱三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早丝织品。这一发现证明、宁波地区附近,是生产丝绸的发祥地,推翻了以往人们一直以为生产丝绸的起源地,是在黄河中下游的片面看法。由此可见长江下游浙东生产的丝绸,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工艺精细,巧夺天工,体现了我们浙东地区,不愧是我们祖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而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港,自古以来就是最早向朝鲜、日本传布生产丝绸技术和丝绸的海上门户。我们的祖先为了无私地向世界各地传布精美的丝绸,不惜自我牺牲,战狂风斗恶浪,以大无畏的精神,终于战胜了大自然,征服了海洋,开拓出东海丝绸之路,体现了我们浙东人民不愧是代表我们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聪明才智的伟大民族。宁波港不但循东海航路可直达朝鲜、日本,而且还能经南海航路,直接或间接通往东南亚、乃至三大洋、五大洲。这条海上大动脉从远古起就把我们宁波与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从而使浙东人民能通过海洋走向世界。今天,在世界各地已经形成了“宁波帮”。他们对居住国和祖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

交流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我们宁波人的光荣和骄傲！

宁波港除向外传布丝绸外，还是外销商品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区。大家都知道唐朝陆羽在《茶经》中把越窑青瓷评为全国第一。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都对它有极高的赞语。瓷器和丝绸一样，也是我们中国最早发明的，因此西方国家誉称中国为“瓷国”英文中的 china(中国)代表“瓷国”，正如希腊文中称中国为“丝国”赛里斯 Serese 代表“丝国”(即中国)一样，它们在国际市场上都有极高的声誉，是最受欢迎的商品。因为它们不仅都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必需品，而且还是供人类精神生活中观赏享受的艺术品，都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融合的结晶。如果说我们浙江生产的丝绸、瓷器、向世界各地，特别是向朝鲜、日本大量传布，在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话，那么，所有这些贡献都是通过宁波港来完成的。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作为一个宁波人和大家一样，感到无比的自豪！

上述丝绸、瓷器的外传，唐宋以来，是以“朝贡贸易”或“市舶贸易”的形式大量运销日本、朝鲜的。所谓“朝贡贸易”是我国封建王朝对外政策的产物。朝贡兼贸易其目的就是在政治上的敦睦邦交、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上的互相交流，兼有物质和精神文化双重交流的内涵。如外国以象牙、香药等土特产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这种物物交换，既是外交上的贡品、礼品，也是外贸上的商品，更是文化上的艺术品。

海上丝绸之路或丝瓷之路，虽然是以瓷贸易开始(瓷器自唐宋才开始)，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了丝瓷贸易的范围，它的东海航路就以宁波港为其中心伸向世界各地，首先将东亚中、朝、日三个兄弟之邦连接在一起，从而又通过南海航路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把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如印度、希腊、罗马、埃及乃至美洲的印加(墨西哥)等古代文明和这些地区的文明古国直接或间接连接在一起，使世界各族人民通过这条海上大动脉的相互传布、融合、交流，使这些古老文明放出了异彩。例如世界三大宗教：印度的佛教，罗马的

天主教(基督教)、波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和中国的儒、释、道,都发源于这条大动脉。经过它的传布,宁波港就成为宗教文化东传的中心。在宁波周围不但有天主教堂、耶稣教堂、有波斯馆、清真寺,更有闻名于世的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保国寺,天台山的国清寺,奉化的雪窦寺和普陀山……等等。这些佛教圣地、名山古刹不但是佛教文化活动的中心,而且这里的许多著名高僧都是佛教文化的传布者,他们在宁波对外文化的交流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宁波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独有的特点。今特简介如下:

唐朝,阿育王寺曾接待过中外著名的鉴真和尚和日僧荣睿、普照,他们都是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使者,日本著名的唐招提寺的建筑,雕塑艺术,医药……等等科学技术,都是由鉴真传入日本的。关于鉴真的业绩有许多专著,我就不在这里细讲了。唐时,日僧来华初期多在北方游历,如圆仁等高僧常去五台山巡礼。自宋朝开始,特别是南宋,长江以北为金兵所占,无法再去五台山,也不能去长安、洛阳游历,当时的禅宗名刹又都在江南,明州(宁波港)的地位就更加重要。高僧们南来北往都以明州港为其海上出入的门户。

宋朝,日僧重源在宁波学习建筑技术,并从日本运来木材帮助建造阿育王寺的舍利殿。他回国时,还邀请许多中国工匠建造日本著名的东大寺,而寺内的大佛就是宁波人陈和卿铸造的。日僧荣西两次入宋,并把唐式建筑艺术传入日本,他在宁波天童寺主持虚庵身边深造,并从日本运来巨木建筑天童寺“千佛阁”。宋孝宗赐他“千光法师”称号。他的弟子明全也来宁波,并老死于天童寺。荣西回国后,光后在日本建造仿南宋的五山十刹,成为日本传布汉文化的中心。他还传入中国的茶种,发展了日本的茶文化。日僧道元也在宁波天童寺拜如净为师,回日后,成为日本曹洞宗始祖。另一方面,宁波天童寺的道隆、西涧(土县)法师则应邀去日本弘法,在日本建造寺院传布中国的佛教文化。

元朝，日僧来中国学习，游历的至少有 140 多人，其中有不少人都到庆元(宁波)阿育王寺参拜月江印长老。他为不少日僧写过语录、诗文，对日本的汉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从宁波赴日的僧人主要有祖元、宁一山等等。祖元是天童寺的第一住持，在日本建造不少寺院，并大力宣扬汉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宁一山是普陀山僧人，在日本居住长达 20 年，他擅长佛学、文学、书法、绘画，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被日本奉为国师。

明朝，来宁波天童寺的日僧有著名的画家雪舟。他曾溯大运河到北京，曾给明朝礼部画过壁画，获得高度好评。雪舟的作品中有一幅水墨画《宁波港图》，画出了 15 世纪时，宁波港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也有力地证明了宁波历来是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另一日僧策彦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用汉文写成两次访华的内容《初渡集》和《再渡集》，在宁波时曾请著名书法家丰坊为其著作写序，至今丰氏的手迹仍珍藏在日本。而宁波人画家叶寅斋所作的《谦斋老师归日域图》赠策彦的这幅画，也珍藏在日本。明朝中国僧人赴日的有宁波天良寺僧祖闾等八人。以上只是中日两国僧人都在宁波直接进行文化交流的荦荦大者。此外，尚有日本僧人使团，学问僧等等经宁波去我国著名城市、寺院进行访问巡礼以及其他各国如近邻朝鲜和东南亚、印度等国的僧人、使者、留学生、商人、旅行家来宁波进行各种文化交流的就书不胜书，限于时间就不再赘述。

明清时代的宁波港，特别是甬江口外的双屿岛(今六横岛)明时，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岛上盛行走私贸易。1547 年，朱纨围攻该岛时，光是逃脱的中外走私船只就达 1290 多艘，商人在贸易中获得惊人暴利，一斤白丝(生丝)运到日本就可卖到原来 20 倍的价钱。此外，江浙沿海一带的海商和破产的农民这时纷纷漂洋过海到南洋(东南亚)、日本、朝鲜乃至世界各地谋生，形成移民高潮。他们带去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在当地开荒种植橡胶等热带作物和开采锡矿传授冶炼技术，促进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城市的商业繁荣

和乡村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连英国殖民者不得不承认，如英人布鲁克(Charles Uynner Brooke)说：“苟无华人，吾人将一事无成”(Without the Chinese, We can do nothing) 在南洋除闽粤华人外，宁波人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二战以后，海外华人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已经不是以前只是出卖劳动力的移民，如今已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专家以及掌握高科技的科学家、财政金融专家和大企业家了。在世界各地的宁波人已经形成了具有国际性的“宁波帮”。这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宁波帮”，是团结散居在世界各地华人，为振兴中华，为祖国和平统一，特别是为宁波的经济起飞和两个文明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宁波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特有财富和依靠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文博简讯

“庆回归”宁波市首届民间收藏精品联展

(本刊讯) 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收藏文化，提高全社会对民间收藏的认识，增强市民的民间收藏意识，提高广大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品位，促进我市民间收藏队伍建设，繁荣民间收藏事业，倡导健康向上、探奇究胜、呼唤新知的高尚情趣，为港城文明建设作贡献。1996年，市文化局在全市范围内举行“甬上藏家”的评选活动，这次评选是对我市民间收藏队伍的一次检阅，通过评选，我们发现我市的收藏队伍人数众多，收藏品类颇为丰富，具有较高的档次，并且产生了一批“甬上藏家”。在这次评选活动的基础上，市文化局、市文博学会、市收藏协会(筹)专门组织11位颇具代表性的“甬上藏家”及其部分藏品举办“庆回归”宁波市首届民间收藏精品联展。展览从7月5日开始到25日结束，展品有火花、烟标、门票、像章、啤标、雨花石、铜镜、玉器、钱币、邮票、字画等种类繁多。通过这一活动，充分展示了我市收藏家的丰彩，也表达了甬城人民庆香港回归后无比喜悦的心情，为庆祝香港回归添新増色。

(褚晓波)

于越族的海外移民

□ 杨成鉴 □

一、中华的江海文化

当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最早的发光点闪烁在中华大陆的何处呢？

中华文化的策源地在黄河流域，其跨入民族文化门槛的闪光点是在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氏族遗址；为此，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人们深信不疑。

然而使历史学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都处于北纬三十度线左右；西方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埃及，其故都孟菲斯在北纬三十度线稍南——二十九度四十七分，而开罗正在三十度线上；古印度文明的代表——哈拉帕文化遗址，也处于北纬三十度线左右；而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策源地却在北纬三十四度线以北呢（半坡文化遗址的坐标为三十四度二十分左右）？由此，作者认为：距今五千年至七千年前靠近海洋的北纬三十线附近区域，是最适宜于人类生存和智能发展的地区，是人类童年的文明地带所在。

众所周知：海洋是生命的发源地，江湖海洋的水产品，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而鱼类食品比其他食品更能促进人们大脑的发展。海洋还能适当地调节气温，有利于形成人类童年时期的生活条件。如古埃及的孟菲斯其东距苏伊士湾，北到当时的地

中海,都不过一百公里之遥;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文化遗址,距海湾都不过数百公里;而为何中华文化的策源地却在中原内陆,离海洋却如此遥远?作为一个人口众多、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难道能脱离孕育她的一般规律吗?

事实终于证实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性:1936年,在杭州市余杭县良渚镇,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1959年被考古学界公认,命名为良渚文化。

历史往往无独有偶,1973年秋天,浙江省余姚县罗江镇河姆渡村,像古罗马的庞贝城重新出现一样,从地下掘出一个掩藏六七千年的原始村落——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是世界著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它代表着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东南江海文化的先驱,其对应的是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内陆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源流的两大历史系统。

二、中国东南江海文化的开放性特色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对古代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知识视野也各不相同。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东经 $121^{\circ}20'$ 和北纬 $29^{\circ}58'$;与孟菲斯、拉尔萨、哈拉帕等文化遗址处于同一地理纬度上。这一带是古代世界中气候条件最适宜于人类生活和繁殖的地方。由于童年时期的人类其生存能力较弱,更多地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

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西亚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等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时间特征:都出现在距今七千年左右;而代表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河姆渡遗址文化,也是距今约七千年左右:四大文明古国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地球气候宏观变化的周期中,在某一地质阶段某一时期的气候环境中,特别适宜于人类体魄和智能的发展,在极其难得的时刻,人类文明的曙光开始闪烁。

地理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河姆渡文化遗址紧靠姚

江，离杭州湾海岸当时仅十多里路。面对着大海，比雅典城和罗马城更接近于海洋。而海洋正是开放的门户。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使河姆渡文化成为开放型的中国江海文化的先驱，它孕育了越族先民开放型的文化：熟悉水上生活的居民，比较发达的江海水上交通，使他们能够向东南沿海、东南亚、日本南部地区迁移和发展，又转展迁徙至澳大利亚和密克尼亚罗西群岛；而越人的足迹已到过非洲和美洲。

三、河姆渡人应是越族先民①

新近发现的象山县塔山遗址②的早期文化层——即第八、第九文化层及墓地，所出土的器物具有河姆渡遗址的文化特征。“年代上相当于河姆渡遗址三期，”距今约六千年，比河姆渡三期碳十四平均值的 5713 年还早些，它们同属于河姆渡文化。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又有各自的特色。这里发掘出 51 具骨骸，笔者所见到的“W34”和“W39”二具保存完好的“塔山人”骨骸：头形短而宽，鼻根较低凹，眼裂开度较大，身材比较矮小：为一米六三至一米六四之间。河姆渡人和象山县塔山人的直系后裔都是越族先民。由于他们的开放性，不少人一代又一代地移居东南沿海，中南半岛与海外。就其头颅与骨骼来看，他们与越南族、壮族、京族、台湾土著居民、日本南部居民之间，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越绝书》说：

畦粪桑麻，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有行，其故何也？③

一直到东汉年间，越地仍然有鸟田。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偶会篇》中说：

雁鹤集于会稽，去避碣石之寒，来遭民田之阜。蹈履民田，啄食草根。粮尽食索，春雨造作，避热北去，复之碣石。

王充是上虞人，当时与句章县的黄墓渡（即河姆渡）同属于会稽郡，其所记述的会稽郡内的情况当为可靠。

在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中发现一些陶塑人头，其中几个头部有横向一列的五个小孔，是用来饰插羽毛的。越族先民将长大美丽的羽美作为头饰。这与河姆渡地区——越地为候鸟集中地有关。大雁等候鸟不仅除去田中的杂草，还为在这里换毛后，留下了大量的羽毛。越族先民在作为头饰以外，更多的候鸟羽毛，用来塞在粗疏的植物纤维纺织品的夹层内，作为冬天御寒之用。“木皮未委，于复塞其羽革，衣挛领，着兜冒(帽)以赅体。”④

这些“木皮”是指藤本植物的纤维，河姆渡人的陶制纺轮将它纺成纱，又织成极其粗疏的原始土布，做成衣服。但是它的御寒性能很差，须要在夹层中铺塞羽毛或兽毛。由于布粗空隙大，大量细羽毛半从布孔中穿出。使外地人看到后，有全身“皆生毛羽”之感，故被称为“羽民”；其地被称为“羽民之国”。

《山海经·大荒南经》说：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淮南子·坠形训》中载有羽民国。毛昭晰先生认为河姆渡人与传说中的羽民国有关，这种见解有一定的理由。笔者认为：羽人的缓读为“于越人”，这正像“倭”缓读为大和，“突厥”缓读为土耳其一样，当然，这种读音演变需要一定的历史时间过程。

因此，无论从地理环境、人种分析、历史条件和民族名称来看，河姆渡人应是越族(于越)先民。

当然，也可以说，河姆渡人是不少族团越人的先民。

行船驭舟是江海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原始开放文化的首要必备条件，而河姆渡人是最早的舟楫发明者，于越人是征服海洋的先导。在河姆渡出土的珍贵文物中，与水上有关的遗物有在第三、四文化层中出土的六支木桨和采集的两件夹碳里陶质的小陶舟模型器。有桨必定有船，但完整的船体保存到 6850 年之久，是不可能的。又在第三文化层内发现一件直径约 60 厘米，中间挖空、残长二米的木构件。构件的一端已残，另一端呈尖头状。它有可能是废弃的独木舟残骸。而在出土遗物中的鲸类骨骼，则是河姆渡人